

← (上接2版)

法必须先提出来,才有去实现的可能性。”巴苏这样说。

普通人的“信念”

美国《谢尔曼法》的失败表明,在新的历史图景下,有一些法律需要被人们重新思考,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智识上,必须有新的概念和方法来应对危机。这也是巴苏在他今年6月出版的新书《信念共和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让法律有效力而不只是一纸空文?他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大众的“信念”(belief)。巴苏说,“事实上,最重要的,不过是普通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琐事的信念和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信念共和国的公民。”这个想法构成了他新的法律和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他称之为“焦点法”)。在他看来,法律就是一个焦点,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

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第二年,巴苏根据他在印度的从政经历完成了《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书,呼吁更多人意识到发展的非经济驱动因素(例如社会规范、国民经济状态和制度基础)的重要性。而在新书中,他进一步强调,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社会大众的思考方式和他们的信念对于决定一个国家的运作方式来说有多么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如何动员这些普通人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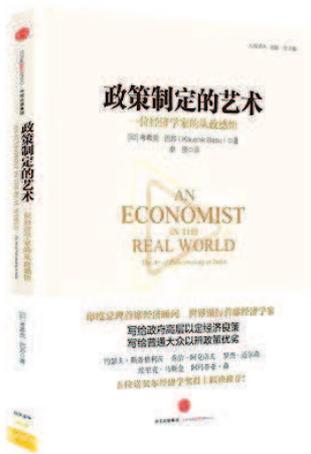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苏提出“利润由全民共享”来应对反全球化情绪,也是在为社会大众注入一种新的“信念”。巴苏强调:“当今世界的重大任务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解决贫困问题和控制社会不平等。如果我们不想要一个不人道的世界,并希望遏制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地区发生的政治冲突,我们必须将控制不平等同经济增长一起视为优先事项。”

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此次中国之行,是巴苏第一次来到上海,他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而感到震撼。在“如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这一问题上,

巴苏也非常看好中国,他认为中国能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抵制西方的保护主义中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在20世纪70—90年代,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告诉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开放、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是多么重要,然而现在是中国、印度等国家来要求美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巴苏说,“因此,当我听到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对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等等都是一个重要且及时的提醒。”

7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南非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的讲话中提出,“金砖国家要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要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这些掷地有声的金句,与巴苏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期望不谋而合。巴苏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应当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推动西方国家的闭门政策变得更加软化和更加开放,促进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巴苏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世界的保护主义以及国际间缺乏合作,是二战爆发的原因之一。科技可以推动人类进步,也可以使人类后退,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我们也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由于技术的进步,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这增加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青年失业率,并导致全世界的工资占GDP比例都在下降。”巴苏说:“我听说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关于分享利润的理论,我希望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进一步发展,并帮助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分享给所有人。”



考希克·巴苏《政策制定的艺术》(中信出版集团,2016)

哲学已死?

编译/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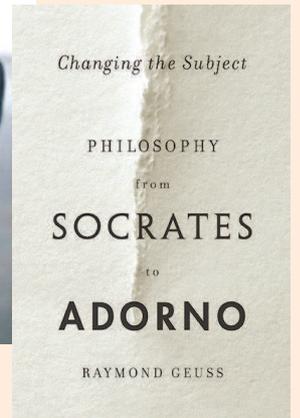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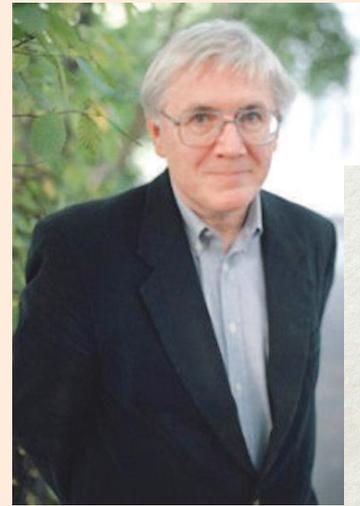
1970年代,雷蒙·格斯(Raymond Geuss)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强大哲学系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年轻同事。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截然不同的:罗蒂是个中产阶级的纽约人,他有一种粗率的概括天赋,而格斯则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工薪阶层,是个吹毛求疵的学者诗人。但他们都致力于左翼政治,而且都拒绝一项主流观点:所谓哲学是一门统一的学科,以庄严的方式向绝对知识迈进。有一段时间,罗蒂和格斯差不多可说是普林斯顿坏小子二人组。

哲学体系谴责像罗蒂和格斯这样的相对主义者,这样的人决意要破坏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神圣区别。但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即使有万能的终极真理这么个东西,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自己是“透视主义者”(perspectivists)或“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s)而不是相对主义者,并相信——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哲学需要“给历史找个角色”。

在2007年罗蒂去世时,格斯发表了一篇优美的悼词,他在其中回忆了一个“密谋时刻”,当时他的这位同伙透露了一项名为“现代哲学的另类历史”的本科课程计划——罗蒂打算在自己的讲课中加入一些被认为是次要角色的人物,比如拉摩斯(Petrus Ramus)、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而洛克、莱布尼兹和休谟这些经典大佬,还有笛卡尔(罗蒂恨得不得了)或康德(格斯恨得不得了)这样彻头彻尾的可恶人物,要被排除在外。

但是,这项“另类历史”课程不了了之。根据格斯的说法,罗蒂怪罪普林斯顿大学的“思想警察”,又称“指导委员会”。不过,40年过去了,格斯的最新著作可被视为罗蒂这项计划的达成。

《改变主题》通过书写12位打破俗见的思想家来叙述哲学史。榜上有名的是苏格拉



剑桥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雷蒙·格斯和他的《改变主题》(哈佛大学出版社,2017)

底、柏拉图、卢克莱修、奥古斯丁、蒙田、霍布斯、黑格尔、尼采、卢卡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阿多诺——笛卡尔、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和康德甚至都没被列入索引。这场“节目”又严谨又活泼,正如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表演都以一种娱乐的精神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他选择的这12位哲学家中,格斯似乎最亲近卢克莱修,卢克莱修鄙视宗教(尽管宗教一词在当时的意义相当不同),他认为世界没有道德目标,对我们的存在完全漠不关心。霍布斯的地位也很高:他创造了“国家”这一概念,作为政治主权的运行轨道,并视之为对所谓“自然权利”或“共同的善”等原则毫不在意的“人为建构”。格斯认为黑格尔是霍布斯的好徒弟,因为他避免了试图将世界运行规律“正当化”,从而给尼采对服务于自我的“真理讲述”和“真实性”理念的强烈抨击开了条道。强调这些人物,令哲学显得几近一场战役,对抗迷惑我们智性的道德感伤。

对抗这种迷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格斯在写20世纪美学家阿多诺的章节中描绘了其中一种。你可能会说,阿多诺鄙视庸人的愚蠢,表现出了知性洁癖,或是对不纯洁表现出了柏拉图主义式的厌恶。他在蒙田身上找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替代选项——

蒙田无意纠正人类的愚蠢行为,却“摆脱了所有这些病态”。

格斯自己也有点像个洁癖患者,这似乎就是为什么他没能与他在普林斯顿的老战友结成持久的联盟。他记得有一次,罗蒂告诉他,他从伽达默尔的作品中获得了灵感。伽达默尔把人类的整个存在视为一场巨大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应该尽量把每个人包括在内,甚至包括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格斯试图让罗蒂相信,伽达默尔是“一个反动的、夸夸其谈的人”,但罗蒂继续他的方式:他开始半开玩笑地自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并开始启用一些老概念来讨论政治问题,比如“人权”、“民主”、“私人生活”,甚至“爱国主义”。他不认为这类词汇有任何理论依据,但发现它们有助于拓展会话圈子。另一方面,格斯谴责它们是“不可救药的胡言乱语”和“毫无根据的幻想,把自己呈现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他对罗蒂的笑话不感兴趣,觉得他的粗率难以原谅。

格斯总结道,哲学已死:他说,其生命迹象在大约40年前就已经消失,过去的激情、创造力已经被尽职尽责的唱诵和历史重立所取代。但这本令人振奋、平易近人的书恰恰证明,他对自己撒了个谎,哲学还健在。

(编译自“Philosophy is dead: Jonathan Rée considers the verdict from a ‘bad boy’ of the discipline”, TLS, 2018.6.20)